

「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  
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  
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wer of Language, Language of Power:  
Where Concepts Meet Political History”**

黃 璿 璋\*

Huang Hsuan-chang

一、會議緣起

由政治大學鄭文惠教授主持「觀念·話語·行動：數位視野下中國／臺灣多元現代性研究」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形塑中國：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共同

---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主辦之「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概念／觀念史圖像中的文學、政治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16年11月18日至19日假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數位展演廳舉行。會議邀請到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資深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菁英研究群協同主持人瓦格納·魯道夫（Rudolf G. Wagner）教授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的蕭高彥教授擔任二日專題演講，並有來自臺灣、捷克、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英國、美國等地共十四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在木柵指南山下交流學界最新的問題思考與研究成果。

當近代中國／臺灣因西學東漸與日本轉植，容受了繁富多元的西方文明與知識、概念，揭開了一個新語、新詞快速生成的新時代，近代中國藉由西方與日本移植來的新語、新詞及概念，也建構了一個新的知識場，開啟了文化啟蒙與思想革命的新型論述與文化場域，其中也富含新語、新詞與舊字、舊話急遽汰選的角力關係及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權力角逐。<sup>1</sup>本次會議涉及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諸多議題，包含語言、詞彙、概念、政治、民族、意識形態、文學與文化空間等；希冀從理論與方法學著手，探討語言與現實、政治論述與政治實踐之間重疊交織的關係，思考並梳理近現代中國／臺灣觀念形塑與概念變遷與廣義權力相關的政治行為與政治論述之間錯綜複雜的樣態。

本次會議係由政治大學中文系鄭文惠教授與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路丹妮（Táša Dluhošová）研究員促成，連結亞洲在地與西方他者觀點，以期掌握語言與政治間的交互作用，並開發出能相互闡明彼此的理論與方法學資源與論述框架，提供更豐富多面而精闢深入的研究論述。從會議主題與子題的規劃，在在能看到詞彙概念、社會事件與文化行動者、文學與政治權力之間，以及人物政治與歷史考察之間

<sup>1</sup> 參見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36-237、258、262。

等的密切關係。其中，觀念行動與變遷與整個廣義權力相關的政治行為、論述、文化，背後形成如何的多重關係？現實社會、政治論述與政治實踐之間又是如何的交互作用？詞彙概念、文本與政治、種族國家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的互動樣態？皆是會議欲開展的面向。本次會議邀集的兩場專題演講與十四篇論文發表，涵蓋了語言政治跟思想解殖、觀念變遷與文化斡旋、知識流動與民族性格、政治修辭與意識形態、概念與隱喻、還有文學空間與再現政治等六項子題。本綜述將以會議子題為綱，回顧各篇研究，並觀察在民族與國家的形塑過程中，所涉及到文化流動與隱喻系統等諸多課題。

## 二、概念／觀念史研究諸議題

### (一)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部分，第一天是由瓦格納教授演講“‘Dividing up the Chinese Melon’: Transcultural Metaphor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Myth”（「瓜分中國」：跨國文化的隱喻和建國神話的構成）。本次論題瓦格納教授承繼先前〈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等研究，認為工業化以後，人民反抗從前威權政府已為歷史事實，反抗的語言遂漸變為相互溝通的概念，成為人民運動的基礎。「瓜分」（divide）在英語中為「分開」之意，但自1840年以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使用「瓜分」一詞，突出帝國霸權以中國為砧上瓜分之形象，以顯示外國征服中國的抽象之意，傳達強烈的國族情感。林則徐（1785-1850）在《萬國公法》用「瓜分」來翻譯“Partition”，用以描述1772年波蘭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國分別佔領的情況，在時人的想像中，波蘭的國家命運與中國重疊在一起。知識分子對「瓜分」的認識主要來自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在此概念下，瓦格納教授說明當時的人普遍認為中國的

瓜分危機，其實並非來自西方國家外部的威脅，而是肇因於國家內部無法發展，政治外交關係亦不良善。面對「瓜分」危機，梁啟超（1873-1929）在《強學報》中指出，波蘭的問題是官惰民亂，公私困窮，而中國若實施對的政策，定會超越土耳其和波蘭。也因為知識分子為了將瓜分所面臨的危險推廣至群眾，瓦格納教授舉出在近代《圖畫日報》、《神州日報》、《外交報》、《警鐘日報》等，不斷可以看見將中國山河作為瓜果剖裂以批評「賣國奴」等的圖像。原運用在歐洲領土被「瓜分」的一個概念，經過中國翻譯以後，隱喻在不同的脈絡間轉換；在國家的相互關係以及在地與全球化的相互牽動之中，「瓜分」的研究也反映出一段非常複雜的國際關係史的變化過程。

第二天則是由蕭高彥教授演講「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語言，以及語言運用」。首先，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所宣導的概念史，試圖從語言視角把握現代世界，以概念變遷以提供「鞍型期」之說的論據，蕭教授提出在1996年德國獅子會工作坊中的某些看法可以使我們反思概念史與歷史研究的方法。英國學者Quentin Skinner認為歷史分析必須具有兩個層次，除了必須回歸歷史脈絡看待政治理論，也必須去看待語言習慣（linguistic conventions）的共形本身，理解該政治理論如何在各脈絡中正當化，以及去描述或分析這些理論如何作為一種介入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s）；而Pocock認為Skinner的說法囿限於英國研究本身，忽略他國論述影響本地思想的可能，如以“state”為例，還可以注意希臘的“polis”、中國的「國」、拉丁的“civitas”或“imperium”等，歷史的行動者如何持續使用（employ）這些字詞。中國的例子可以在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作品與嚴復等人的翻譯中可見。孟德斯鳩將政體分為“republic of monarchy”、“despotism”，“republic”又區分為“democracy”跟“aristocracy”，各詞在西方甚至可以溯洄古希臘字詞的脈絡。而在1900年《譯書彙編》裡《萬法精理》的翻譯，可見政府的形質有共和、立君和專制三種，此為日譯名詞，而張相文在

1902年翻譯的《萬法精理》中，卻說到政府有共和政治、立憲政治跟專制政治三類，其中「立憲政治」即為“monarchy”。值得注意的是張相文將日譯本中的「立君」全數改為「立憲」，這也受到了嚴復的批評。嚴復在1904年將三種政府形制翻譯為公治、君主跟專制，說到孟氏區分公治並非專制，所謂的獨治就是“monarchy”，之中並沒有民權也不是立憲的君權制，只不過是有法之君主而已，不宜譯此書的「蒙納基」為立憲。在蕭高彥教授的演講中，關鍵字詞從拉丁文到英文，再從英文到日文、日文到中文的層層轉譯，皆具有不同的詮釋；在轉型時期，當翻譯經過多層次的轉變之後，將會失去其原始的意義；在研究觀念史中的關鍵詞時，仍必須爬梳各歷史脈絡性的種種因素，才能去建構從概念而來的語言，與所謂的相關論述（discourses）。

## （二）語言政治與思想解殖

本次會議第一場「語言政治與思想解殖」，首先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發表〈與社會主義接軌——1950年代新疆突厥語族文字拉丁化方案興廢背後的語言政治史〉。本文指出原突厥語族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文字，主要借重阿拉伯文，但在近代突厥語族幾次的文字改革，都可見政治因素的重要影響。由於阿拉伯、希伯來等語言都是由右到左書寫，與數字由左至右的書寫有矛盾，所以不利學習，1926年，蘇聯政府開始在境內各突厥語民族中推行以拉丁字母拼寫的新文字，取代長期沿用的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舊文字。學理上的理由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文字與突厥語言間存在著衝突；政治上的用意卻在切斷突厥與穆斯林與波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聯繫。而中共建政初期，受到蘇聯文字改革影響的維吾爾、哈薩克知識分子，也訴諸文字改革，主張維吾爾文西里爾化。但隨著中蘇蜜月期的消失，漢語文的文字改革議題與全大陸範圍內的

「反右」政治運動半路殺出，打斷了這一進程。1957年漢語拼音方案最終確定使用拉丁字母，而非社會主義老大哥使用的西里爾字母，中共盡力消除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切斷當地的突厥穆斯林與中蘇邊界另一側的同胞之間的聯繫。種種文字改革，皆與政治密切相關，以致於新文字1980年代遭到廢止，這也反映當地人民對高壓政治的反彈。

次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劉紀蕙的〈知識型的內部殖民與解殖：重探儒家的天人合一與自我創造性轉化〉，討論亞洲與其他地方的知識型內部殖民過程，並思考知識權力的結構以及如何可以提供再思考。為了抵制深刻的知識殖民，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曾主張透過「知識脫鉤」（epistemic de-linking）或是「知識不服從」（epistemic disobedience）來進行解殖的工作，從殖民與後殖民處境進行「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米尼奧羅以杜維明提出的儒家思想為例，說明對西方知識與西方理性去底層化之可能，然而，杜維明的「天人合一」說，卻存在儒家自我創造性轉化的內在悖論。當杜維明「天人合一」以及「創造性轉化」的儒家傳統建立於共識的符號交換關係，習慣性的社會關係卻可能存在內在不平等的殖民性壓迫關係，形成儒教中國專制政體的擴散與合理化的政治工具，從康有為（1858-1927）以孔教為國教、滿洲國的「王道樂土」，至臺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國大陸的新儒家說法皆可見到。如要將儒家知識進行解殖，劉紀蕙教授認為或許能從章太炎（1869-1936）的說法進行修正。章太炎所提出的「轉注假借」與「孳乳對轉」反映出了構成話語宇宙的「天」以及回應時代需求的「人」的相應位置；其堅決反對「法古」或是「法先王」，並以「譏上變古易常」的《春秋》作為師法的對象，展現明確的批判力與政治性。如果說知識型有其解殖的可能性，這個鬆脫既定共識體系的契機，即來自於內部「譏上變古易常」所打開的裂隙。

### (三) 觀念變遷與文化斡旋

本場次首先由英國愛丁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蘇格蘭孔子學院院長費南山 (Natascha Gentz) 發表 “Transnational Negotiations of Terms and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Idea of ‘Press Freedom’ in Late Qing China” (中國晚清時期與「新聞自由」概念相關之詞彙與觀念的跨國斡旋)。十九世紀早期西洋報刊的出現，為中國時事的公眾討論注入新的媒介，但也帶來了對合法言論與公眾表達的討論。當英國與中國的記者以及政府之間發生衝突時，針對「新聞自由」觀念的各種詮釋進行討論便成為當務之急。本文以法庭案件為對象，在大清例律的法律規範及主要由英國新聞法與外國法律判例主導的會審公廨所提供的脈絡下，探討當時針對新型報刊所扮演的角色。藉由比較英國與中國對於新聞自由的不同理解與處理方式，本文指出早期英國主導新聞自由在報刊市場中的詮釋，新聞界開始出現「公平的公眾討論」、「謠言」、「毀謗」與「誣告」等詞，而在二十世紀以後，美國對中國新聞界的教育與宣導，才使「言論」與「出版自由」等單一概念，發展為整體的「新聞自由」。

延續對「自由」的討論，第二篇論文為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教育學研究科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沈國威發表的〈近代譯詞創造：嚴復與「自由」——日本作為參照項的考察〉。本文認為「自由」與「科學」一樣是表述近代社會關鍵概念的關鍵詞，也是理解嚴復 (1854-1921) 的鑰匙。“freedom”與“liberty”的翻譯，早期或為自主、自由、治己之權、自操之權、自主之理。中國真正出現大量的「自由」是在1905前後的《申報》，可能受到了日本翻譯為「自由」的影響。嚴復在翻譯時，亦採「自由」，並對過去自主、自專、自革、自主宰、任意、寬容等譯詞進行辯駁。沈國威教授蒐集嚴復所有提到「自由」的文本，觀察與自由的搭配詞，如奴役、臣服、約束、公道等，並認為嚴復重新定義出兩種自由：一種是政府的，是不受干

涉的自由；一種是貿易自由、報章自由、婚姻自由等等個人的自由權利；解讀出嚴復在傳播西方自由思想時所遭遇來自語言的限制，及嚴復為克服種種困難所做的努力，試圖為思想史、概念史研究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語言場景。

第三篇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沙培德（Peter Zarrow）的“Utopianism and Liber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Chen Duxiu and Hu Shi”（晚清—民國時期（1890-1930）中國的烏托邦主義與自由主義），本文探討烏托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某些流派在現代中國政治思想中隨處可見的重合。烏托邦概念可上溯至康有為，但沙培德教授檢視蔡元培（1868-1940）、陳獨秀（1879-1942）與胡適（1891-1962）的相關論述後，認為這些思想家雖提出烏托邦概念的不同版本，但本質上是相同的自由文明秩序。這三人的中心思想分別為美學教育、民主與科學。這些觀念並未呈現出這些思想家的最終目標，而僅是作為改善文明秩序的手段與方法。他們所勾勒各種被解放的未來，既立基於對神權、階級與權力的主張的自由懷疑論之上，同時也源於他們對於人類環境必然出現根本轉變這個可能性的信念。這種超越人類現況的主張與自由主義所側重的「中庸」，二者之間的確存在矛盾張力，也因而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顯得與眾不同。

#### （四）知識流動與民族性格

本場次首先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學助理教授李蕾（Leigh Jenco）發表的“Is there ‘Philosophy’ Outside the West?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ebate and the Global Extension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西方之外是否有「哲學」？——「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爭論與學科知識的全球化拓展），中國思想怎麼變成中國哲學？本文首先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在西方哲學的衝擊之下，毛



子水（1893-1988）、俞士鎮（生卒不詳）、胡適等人對於中國思想不應拋棄，發掘其中價值的論述，並對照回今日中國哲學家的二種說法，一為如何將中國思想與西方哲學嫁接，一為強調「講自己，自己講」，擺脫西方哲學學科影響並發展自身脈絡的兩種說法。李蕾教授認為中國哲學並非相對西方的他者知識，應將中國思想與西方哲學之間的知識作為產生問題的架構，研究者不應只討論有沒有中國哲學，或有沒有西方哲學，應將哲學的背景問題化，討論背後的文化背景。

另外，捷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東亞系研究員、專任教師胡吉瑞（Jiří Hudeček）發表的“Mathematic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in 1930s China”（中國1930年代的數學與國家特質），指出了1930年代中期，中國數學史學家在近代數學史上的豐富爭論。當日本史學家三上義夫（1875-1950）視數學為整體國家文化中的一個特殊分流，認為其發展基本上是由族群的生物條件所決定時，中國數學史學家的研究亦受到了刺激，研究者如李儼（1892-1963）、錢寶琮（1892-1974）皆強調中國自古在不受外國的影響下，已生產出傑出的數學能力。這種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數學史研究，可以以德國數學家比伯巴赫（Ludwig Bieberbach，1886-1982）為代表。然而，民族主義數學史的研究，也受到日本數學家暨史學家小倉金之助（1885-1962）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小倉金之助拒絕民族性標籤與文化式史學，種種批評皆在中國受到了廣泛報導，並影響了吳藻溪（1904-1979）等人的研究。從胡吉瑞教授的文章，可以見到，即便是在國家主義高度發展的時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仍認同數學的普世價值，並且拒絕將數學與某些想像出來的國家特質相連結。

##### （五）政治修辭與意識形態

本場次首先是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路丹妮（Táša Dluhošová）發表的“Trajectories of Ideas: Mainl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and Their Writings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觀念的軌跡：在臺中國知識分子及其於二戰前後的書寫）。陸丹妮教授結合知識的社會學、文本分析與話語分析，將焦點放在戰後臺灣文學、政治文學的場景，並強調個人文學家在群體之中，如何用意識形態夾雜的話語，及話語如何隨著時間的、關鍵的話語的變化。本文鎖定二戰前後文壇中的代表人物：雷石榆（1911-1966）、范壽康（1896-1983）、曾今可（1901-1971），並選擇三個時期：1935年至1940年、1941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以數位方法，包含認出關聯詞、語義場（semantic fields），以及比喻語言：共現詞素（collexemes），理解作家或知識分子如何寫作。從被動語態情態動詞（如「該」、「要」、「必須」、「可」等）與「建設」、「發展」、「抗戰」、「普及」、「承擔責任」等關鍵詞，陸丹妮教授認為隨著抗戰時期意識形態的轉變，寫作主題從戰爭轉為口號的宣傳及其呈現的緊迫感，這也可以理解知識分子的角色從外於國家機構的位置到參與宣傳國家的變化，利用電腦輔助分析大量的資料，分析出二戰前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的地圖。

如果路丹妮教授強調知識分子扮演中介的角色，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林昂（Ondřej Klimeš）的觀點則更加重視從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的建構。在“Creating Authoritarian Ideational Order in Sheng Shicai’s Xinjiang: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Life*”（製造獨裁的思想秩序與盛世才政府治理下的新疆：《新生活》雜誌的個案研究）一文中，林昂教授認為盛世才（1897-1970）政府1930年代在新疆使用觀念話語和修辭使其政府合法化，但並不構成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盛世才用各式各樣的觀念控制了維吾爾民族，這些現代化的觀念包括反帝國主義、民族平等，以及民族主義價值觀，最重要的媒體是維吾爾語的報紙。盛世才利用早期東突厥史坦伊蘭共和國提出的概念，雖然盛世才是用了與民國初年軍閥相似的想法，看似拒絕突厥民族主義，但是也繼承了為伊蘭現代主義知識分子現代化的計畫。在本文也可以發現，1930年盛世才在新疆建構的觀念與思想秩序，成為

1949年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的有力、穩定的基礎，如“liberation”（解放）、“rule of law”（法治）、“unity of nationalities”（民族團結）、“social cohesion”（社會凝聚性）、“patriotism”（愛國主義）與“modernization”（現代化）這些觀念，也表示了新疆、中共與蘇聯的一種聯映性與黨國的影響。

## （六）概念與隱喻

本場第一篇為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教授宋寅在發表〈人權、知識人、政治〉。本文討論現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觀念「人權」及其行動者「知識人」，觀察人權觀念自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如何成為新型政治的主流基礎，知識人又如何將人權作為中國必須從西方學習的核心課題之一。本文將人權觀傳入中國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為「宣傳階段」，強調天賦人權。人權最初被翻譯為「民權」，但在梁啟超「人人生而固有之自由自治的權利」與日本翻譯的影響最終定型為「人權」，在1916年以前也可見到，陳獨秀、高一涵（1885-1968）等人在談論人權跟國家的關係時，總是人權優先於國家。第二期「實踐階段」，當時國民政府雖頒布人權保障令，但所認為應保障的人權又非原本人權保障的理念，三〇年代自由主義者如胡適等人即開始對國民政府展開批評，此論爭後來也加入魯迅對胡適「人權」之內涵所展開的批判。第三期「進步階段」，則將視野拉至當代，分析評論現代中國的現狀，宋寅在教授以皮膚和毛的關係比喻人權與現代中國主權文化的相對主義，並與韓國的人權運動作比較，提出未來落實人權的諸多可能。

當宋教授聚焦於「人權」，湖北經濟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邱偉雲則從近代中國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平等」切入，〈觀念的鬥爭：論中國近代平等論述中政治修辭與隱喻結構的多重展演〉一文研究清末民初重要政治類報刊，包含立憲派的《新民叢

報》，革命派的《民報》，以及無政府主義派的《天義報》、《新世紀》等，認為晚清知識分子伴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具有各自不同主軸的平等觀念論述與訴求：立憲派訴求君主立憲下的君民平等觀，革命派卻訴求推翻滿清下的滿漢平等觀，而無產階級則主張既不要君主立憲、也不要民主共和的無政府主義之一切平等觀。而政治立場的不同也形塑出具差異性的平等譬喻，如革命黨人用「天經地緯譬喻」，凸顯的是平等觀念的普遍性與公理性、合法性，而立憲派則以「蛇蠍譬喻」與「洪水猛獸譬喻」，凸顯平等觀念的暴力性。本文透過「平等」詞彙／觀念的譬喻／隱喻修辭的考察，勾勒知識分子透過何種譬喻／隱喻結構進行觀念傳播以及政治鬥爭的軌跡。

### （七）文學空間與再現政治

本場次三篇論文皆以文學文本為考察對象，首先是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鄭文惠的〈身體政治與日常現代性：周瘦鵑社會諷喻小說的都市敘事〉。當世俗大眾作為都市文化日常生活的參與者，翻轉了傳統主流社會「由上而下」的規訓文化，在周瘦鵑的社會諷喻小說中，可見這一種平行的、「由下而上」進行社會位階翻轉的可能性。全文分從日常性與日常現代性、現代化危機與差異時間地理學、奇異化技藝與革命、啟蒙、超空間感與圖繪大眾感覺氣象圖等面向，論析周瘦鵑如何繪製上海世俗大眾日常生活。周瘦鵑社會諷喻小說中多處觸及都市空間現代化所隱藏的危險，如〈最後之銅元〉、〈汽車之怨〉、〈腳〉、〈血〉等，尤凸顯出摩托卡、汽車、升降機、電車等現代化工具之危險及造成的禍端，與社會底層的勞工和無產階級中無以計數的男女老少以血祭殉身的肉身性，展演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種差異時間地理學的另類的社會建構。除了召喚現代性情境下的各種欲望外，周瘦鵑同時也以小說進行革命與啟蒙，如〈試探〉、〈聖賊〉、〈亡國奴家裡的燕子〉，再現了日常經驗的特殊性與透過奇異化的創造性

拼貼、並置日常生活世俗大眾偶發性、異質性的卑微事件外，當中也存有小說家對「孝道」、「自新」等關懷與反思，述說著新時代世俗大眾新的可能與新的未來的同時，也販賣新時代的希望與未來。而〈對鄰的小樓〉以「發端」、「第一章 第一家住戶」、「第二章 第二家住戶」、「第三章 第三家住戶」、「第四章 第四家住戶」、「結論」的結構形式組成，一系列在對鄰小樓空間中上演的世俗大眾的情感，作者分從不同視點和角度排列組合、敘述情節，猶如電影透過蒙太奇的方式，展現世俗大眾感情因都會文化的轉變所產生的劇烈衝撞與擺盪。

第二篇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黃美娥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魏亦均發表的〈認識敵人的方法：林適存《紅朝魔影》的歷史敘事與文學政治〉。1949年國共決裂後，許多知識分子從中國內地出走至香港，創作大量反映難民生活的「難民文學」。起先創作者尚未因左右翼兩大集團的意識形態之別而相互對抗，直到嚴慶澍在《新晚報》發表〈金陵春夢〉與林適存於《香港時報》刊載《紅朝魔影》，因而進入對陣作戰。自此，香港的反共文學作品蠡出，而其做為中華民國反共前哨的姿態也愈加明顯。林適存創作《紅朝魔影》之用意，乃在於揭露紅朝政體的真正本質，剖析共產黨玩弄陰謀的幻術，以及因應新政權建立人心受到蠱惑所產生的種種行為魔影。小說一方面描述解放之後紅朝發展小史，一方面陳述逐步實施的各項政策與相關情形，例如土改、三反、五反、新婚姻法、抗美援朝等；大抵，透過當時相關匪情歷史、政策實施的描摹，從中可見語言與現實、詞彙與權力、文學與政治的交涉，也同時具體展演思想辯證、政治論述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交鋒，故被國民黨軍統派推許為能提供一個認識所謂「共匪暴政」比較有組織、系統的敘述模式，以及饒富書寫策略的文藝手法，具有提供認識敵人的方法意義。另外，因林適存1951年在香港率先寫出反共文學作品，於1954年來臺後，又繼續投入創作與推廣，因此形塑出臺、港反共文學先鋒與推手之姿，且直到七〇、八〇年代仍對反共文學念茲在茲，不斷反省和重估，對於臺灣

文學的走向具有重要影響。

最後，為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陳國球發表的〈文學批評的文化政治〉。陳國球教授近年與其他學者共同編纂《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此次陳國球教授以編「文學評論卷」時的思考，重新分析「文學批評」的傳入與香港文學的生成。陳國球教授一開始即說明，1919 年到 1949 年期間，「文學批評」傳入現代中國的意義有二：一為「文學」為焦點，促進文學接受過程的知識化，由感受欣賞轉化成分析評鑑，從而為「文學」進佔大學教育的席位，提供支援；二是以「批評」精神為重，以為「批評」的提倡，能促進新思想，改變民俗，引導文學與文化甚至國家民族朝「現代」方向發展。此種文學批評為香港文學帶來不同的風景，首先是左翼文學工作者赴港，與從事左翼活動時對香港的評論，批評香港為畸形發展的商業社會：外表為摩登大樓，內面卻非常守舊，有志之學生應投身革命、改革現狀。其次，香港學生介紹的黴黴派（Dadaism）影響頗劇，當時的學生引介黴黴派不假日本翻譯，直接閱讀 Sheldon Cheney（1886-1980）“Why Dada?”（1922）等作品，解釋黴黴派的前衛、打破傳統、回溯文學本源，解釋「文學革命」的性質。第三，南洋華僑戴隱郎（1907-1985）的象徵主義詩歌，除了留下許多詩、木刻、文藝理論外，也高舉左翼詩學等於祓除個人主義的儀式。最後，陳國球教授也提到文學批評也帶來許多早期的比較文學，將王漁洋（1634-1711）的神韻說等於象徵主義等等。陳國球教授認為，雖然香港的文學評論據多重路徑、外表「畸形」，但反而發揮了因「畸形」而特有的文化力量。

### 三、圓桌論壇：觀念史圖像： 概念、政治與歷史的交會

目前東亞區域的觀念／概念史研究在各地皆受到重視，如韓國翰

林大學歷時近十年的韓國概念史研究，並出版九本專書與概念史雜誌；政治大學也已出版十期的《東亞觀念史集刊》；大陸方面則有方維規教授每年舉辦的思想與方法的國際研討會；南京大學的孫江教授也期望能編輯一百本叢書討論和東亞密切相關的觀念／概念；此外，捷克、德國、英國也延續早期對概念史研究議題進行深掘並出版相關刊物。本次會議難得地邀集到不同區域的代表性重要學者，經過兩天的討論後，設有「觀念史圖像：概念、政治與歷史的交會」圓桌論壇，在陸丹妮教授與鄭文惠教授的主持之下，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對此議題集思廣益，回應大會主題「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並討論觀念／概念史方法，與跨語際研究中可能遭遇的問題與思考。

儘管在大方向的概念凝聚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從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但如何進行「跨語言」或「跨文化」，卻也是在概念史研究上相當困難的問題。瓦格納教授認為，研究上的問題，第一是定義的問題，定義又必須考慮翻譯與字彙上的運動與傳播；第二則是技術上的問題，目前的數據庫是由多種不同的數據庫所建置，但未來或許我們還能期待全球性建置的數據庫。費南山教授亦認為觀念／概念史是跨文化的傳播與翻譯過程，翻譯也並非單一線性的授受關係，而是複雜曖昧的生成樣態。此外，考慮概念時，也必須將圖像納入其中，進而做到比較的概念史研究。作為政治理論家的李蕾教授，則回到大會議題上，認為我們應當承認，用來剖析語言的「方法」，其實也是受到權力的影響，展現權力不平等的狀態。會議中所見的研究方法大部分來自西方，而用西方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政治上、歷史上、思想上的現象，當中也涉及語言和權力的關係。李蕾教授提醒，我們還要注意中國是否有獨有的思想方式或脈絡？如何將這些方式醞釀成未來學術的方法，或審核標準與架構？這可以成為未來研究者們思索的項目之一。回應「語言的權力」主題，研究詞彙學的沈國威教授認為我們必須要再去定義何謂「權力」，「權力」在詞彙層面、在表達的可能性、在外部語言如英、日語的應對上都需再釐清。「權力」其實也可以是

值得脈絡化研究的關鍵詞，沈國威教授以「科學的國語，國語的科學」為例，科學的國語，意即語言必須具有科學性；國語的科學，則是說國語可以用來進行科學的紀事。這個問題影響了1915年以後，胡適所提倡「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胡適所提出講究文法的問題，又與如何使國語具科學性的問題息息相關，而諸多問題其實又與權力難以分割。

深入東亞各區域的觀念／概念史研究，宋寅在教授分享了韓國概念史研究的現狀。韓國概念史研究原是由國際政治學系進行，聚焦於外交、國際政治，與不同語言國家之間的交流關係。翰林大學的專長亦是國際政治學，在宋教授任教翰林大學後，翰林大學的政治學系又與人文社會學科合作研究概念史。宋教授指出，韓國研究概念史是因為若有兩個國家發生衝突，很大的原因即在於概念的衝突。國際間的衝突必須先解決在概念上的不一致，以便防止矛盾的問題產生。緣此，韓國很早就投入國家的專業人才，十四年來不斷出版韓國的概念史叢書，期望深入政治、文學、經濟等各方面的研究，為韓國目前的重點學科。陳國球教授則對文化、社會、政治等概念在香港的情況做補充，以最近王德威教授與史書美教授所提倡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為例，當華語語系將「中文」區分為漢語、華語、國語、普通話時，在香港僅有廣東話／粵語與中文的差別；而前者不僅是日常口說語言更是書面語言，與「中文」在使用上幾乎是完全分開的。在香港，「中文」跟廣東話其實有一種競爭的關係，講廣東話的人聽不懂國語的時候會有種排外感。而在1967年到1974年間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也帶來反殖民、反英國、反殖民統治種種不公平的政治思考，民間、政府、左翼分子對應該以何種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各有主張。直至今日，語言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仍在香港不斷作用，語言本身的使用情況也是觀察文化、社會、政治等概念的重要切入點。

延續陳國球教授的討論，當香港內部面對語言使用表現出掙扎的



困境時，黃美娥教授認為臺灣語言的問題同樣也值得關注。近現代東亞各地區其實都涉及漢語與日語的關聯問題，從日常語言到國家語言，當中即涉及到殖民性與現代性的諸多面向。黃美娥教授近期正在處理國語運動與臺灣文學史之間的關聯性，指出1945年到1949年，當時的報刊會使用日文、漢文、中文、國文、國語、白話文等詞彙，詞彙背後所折射出的觀念與權力關係都各不同；1945年以後，臺灣曾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其影響一直蔓延到現在，而我們如何來看待「國語」的觀念？「國語」的聲音為「國音」，紀錄聲音的形體叫「國字」，聲音形體排列的組合，表達出來的思想叫「國文」，其排列組合的規律又叫「文法」。國語剛被提出時，不只聲音與文字的問題，它還牽涉到一個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國體」問題。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魏建功（1901-1980），曾提出由臺語學國語，但最終卻失敗，最後才推動注音符號。除了發音／聲音語言需要一致，白話文的典範書寫也被拿來討論：臺灣人在日治時代所使用的北京白話文書寫到底夠不夠格？從國語運動衍生到白話文運動，文學的問題在於臺灣文學如果要與中國文學嫁接，以前用北京白話文寫的東西是否可以直接納入中國文學中？臺灣文學到底要如何書寫才夠格被稱為中國文學？原先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完全搭不上用中文書寫的風潮，因此臺灣有「被詛咒的文學」的討論。跨越語言的一代，須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經驗的創作，當中又衍生出文學地位的問題。從國語運動來看，其實衍生太多與整個臺灣文壇變化的問題，如新舊文學論爭等，而背後被壓抑的臺灣方言又演變為母語運動。

本次論壇也開放與會學者們問答，義大利羅馬大學東方學系副教授費琳（Casalin Federica）針對宋寅在教授所談的「人權」問題，詢問清末民初時人對人權概念的看法與辯論？在中國跨文化、跨語境的觀念中，中國對「人」或「人權」的概念是否也是從西方接受而來，研究者是否可以關注中國本土自身「人」的概念及其自身發展。而宋教授在回應中，說到因其畢業於中國哲學系，研究焦點自然也關注到

古代至當代，以及毛澤東（1893-1976）所有對「人」的概念，研究概念史仍須注意到當地脈絡與跨文化之間碰撞而出的種種差異性與相似性問題。瓦格納教授也補充道，一個「人」有生命的定義，是源於十九世紀中的太平天國。人的提出不同於梁啟超「國民」的提出，「人」必須要有能動性，在概念研究上也必須明白「人」是各方話語論述角力的結果，當中也充滿著衝突與協商。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丘為君則請教沈國威教授，提到在世紀末前後，有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到日本學習。梁啟超曾自創一個方法標示日文，以此學習知識，而在梁啟超以外，當時那麼多留日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他們到底是用什麼方式克服日文方面的障礙？在當時非常封閉的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會特別學習日本文化，而是透過日本學習西方的這種知識，而他們跟日本之間的認識、情感、糾結到底是什麼？沈國威教授則回應，日語成爲東亞普通語的概念，是因爲新的概念用兩個字的漢字詞譯出，舊的詞彙則保留跟漢字詞對應，這也維持了漢字文化圈的流通。1904年前後，大量留學生爲了快速學習翻譯，現在可見當時留下來的教材就是講義錄《新爾雅》，當中對詞彙有作簡單的解釋，使留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術語的建立。

整體而言，本次圓桌論壇討論的方向非常趨於一致，探討了語言上的問題。文化主體的內在多重結構與內在的能動實踐可能性，會交雜出非常複雜的結構；而發言皆回應了瓦格納教授所言，國家在施作權力時，控制語言的作用在不對稱、不對等的跨文化流動中，異文化之間如何雜交或協商，以及整體脈絡化的轉向。最後，主持人鄭文惠教授也指出大家關注的問題，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替「語言的權力，權力的語言」作總結。首先是在一個不對稱的權力結構下的概念，跨文化的流動歷程中，如何進行跨文化考掘學？文學／圖像做爲概念／觀念的多重中介的載體時，如何變成能凝聚情感或指導行動的工具？這是研究概念／觀念時必須同時關注的面向。另外，語言與權力結構與行動者之間連結時，是否會形成一個意識形態正當化、合法化，以

啟動認同機制的共同行動的可能？關注話語權力合法化的修辭邏輯外，也需關注具有權力關係整體的知識結構如何內在殖民？如何思想解殖的問題。做為研究者，必須洞悉背後的觀念系統，並進行更深刻的批判、反思，進而帶出一些新的可能與新的未來。